心理学报 2018, Vol. 50, No.5, 517−527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8.00517

流动和城市家庭中母亲的控制策略与幼儿顺从行为*

武 萌[1,2] 陈欣银[3] 张 莹[1] 卢 珊[1] 王争艳[1]

([1]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48)
([2]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 新乡 453003) ([3]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 美国费城 19104-6216)

摘 要 对122名3岁幼儿及其母亲(流动家庭46户)进行评估, 考察母亲控制策略的特点、母亲控制策略与幼儿顺从行为的关系以及家庭类别和性别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 (1)流动和城市母亲使用最多的均是命令性控制; 流动家庭母亲使用的强制性控制多于城市母亲, 温和控制略少于城市母亲。(2)两类家庭中, 不同强度的母亲控制都与幼儿的情境性顺从相关。(3)流动家庭母亲的强制性控制正向预测男孩的合作性顺从, 负向预测其不顺从; 流动家庭母亲的强制性控制负向预测女孩的合作性顺从。

关键词 控制策略; 顺从行为; 流动家庭; 城市家庭; 儿童性别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母亲控制策略(maternal control strategy)指在母子互动过程中, 母亲为限制、指导或修正幼儿正在进行的行为, 引发期望行为所使用的策略(Schaffer & Crook, 1980)。按照控制强度的高低, 母亲控制策略通常分为强控制策略和弱控制策略, 前者包括强制性命令、干涉、禁止、批评等, 后者包括指导、解释、建议、鼓励、非直接请求等(如: Chen et al., 2000; Liu & Guo, 2010)。也有研究者进行了更细的划分, 除了强、弱控制策略, 还提出中等强度的控制策略, 主要指不含强迫的直接命令(Crockenberg & Litman, 1990; Huang & Lamb, 2014)。母亲控制策略直接影响儿童顺从行为。顺从行为(compliance)指幼儿对成人要求的反应, 或根据规则调节自身行为的能力(Kochanska, Coy, & Murray, 2001), 是儿童早期社会化和内化社会价值、社会准则及道德发展的重要指标(Kochanska & Aksan, 1995)。广义的顺从行为包括: 儿童对成人要求的认可和服从, 即合作性顺从(committed compliance); 对成人命令的暂时性服从, 即情境性顺从(situational compliance); 以及对父母指令的忽视、公开反抗、拒绝等不顺从(noncompliance)形式(Kochanska & Aksan, 1995)。顺从行为是儿童早期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方面, 3岁前得到快速发展(Kochanska et al., 2001; Kopp, 1982; 董书阳, 梁熙, 张莹, 王争艳, 2017)。根据Kopp的观点, 在年龄较小的儿童中, 自我调节能力与父母养育之间的关联比年龄较大的儿童更强(Kopp, 1982; Kochanska et al., 2001), 同时, 一项元分析研究也指出, 与自我调节的其他方面(如抑制、情绪调节)相比, 顺从与父母控制的联系更为密切(Karreman, van Tuijl, van Aken, & Deković, 2006), 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发展心理学家关心的话题。多数研究认为, 母亲的指导、温暖引导等弱控制策略促进幼儿的合作性顺从, 而母亲的惩罚等强控制策略会引起幼儿的情境性顺从或不顺从(如, Chen et al., 2003; Huang & Lamb, 2014; Kochanska & Aksan, 1995; 陈会昌, 李冬晖, 侯静, 陈欣银, 2003)。

收稿日期: 2017-04-10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470994)资助。
通信作者: 王争艳, E-mail: wangzhengyan@cnu.edu.cn

母亲养育是一种文化活动，其目的是帮助幼儿成为其所处文化环境的产物(Bornstein & Cheah, 2006)，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可能会采取特定的养育方式，促使幼儿发展出与文化相适应的行为(Chao, 1994)。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过渡到家庭化迁移阶段(陈卫, 刘金菊, 2012)，常见的情况是父母携子女迁移到流入地。学龄前流动幼儿的发展逐渐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尚缺乏流动家庭养育特征的相关证据。流动家庭虽然进入城市生活，但他们具有不同于城市家庭的特征，如：社会经济地位低，主要表现为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张云运，骆方，陶沙，罗良，董奇，2015)；生活中面临诸多挑战，如工作不稳定、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差、社会保障差等(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2012)。此外，流动父母的养育目标也与城市父母不同，城市母亲更加鼓励儿童的自主性(邢淑芬，孙琳，王媛，王争艳，2012; Chen & Li, 2012)；而流动父母受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更强调孩子对父母的依存性及对父母权威的服从(Wang & Phinney, 1998)，以便于帮助儿童学会合作、顺从和自我控制(Chen & French, 2008)。由此可见，流动家庭和城市家庭分别代表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开始探讨流动家庭父母的养育特征，那么，流动家庭中的母亲在养育过程中所使用的控制策略及其对儿童顺从行为的影响是否有别于城市家庭的母亲，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

家庭压力模型(family stress model, FSM)认为家庭的经济困难会通过一系列家庭内部过程影响儿童发展。具体来说，家庭的经济负担会使父母的压力升高，从而引发抑郁等负面情绪，导致父母间的冲突和敌对，使家庭功能受损，进而影响父母养育，引起更多的控制和惩罚(Conger & Donnellan, 2007)。如，欧裔、非裔和华裔美国家庭的研究均发现，家庭的经济困难会通过一系列因素影响父母的养育，使他们表现出高敌对、严厉及低温暖等特征(Benner & Kim, 2010; Conger et al., 2002)。国内研究也发现，学龄期和青春期流动儿童的父母养育方式比城市儿童的父母更为消极，主要表现为温暖和理解更少，给予孩子的自主权更少，更多使用拒绝、严厉惩罚、过度干涉等策略(Zhang, Eisenberg, Liang, Li, & Deng, 2017; 张茜洋等, 2017)；对于学龄前儿童，流动家庭中母子关系的亲密程度低于城市家庭(李燕芳，徐良苑，吕莹，刘丽君，王耘，2014)。如前所述，我国流动家庭具有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特征，基于家庭压力模型，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考察流动家庭母亲对 3 岁幼儿的控制策略是否具有与城市母亲不同的特征。

其次，根据家庭压力模型，低社会经济地位母亲通常更为专制，更多使用控制和惩罚策略，这又会给儿童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使他们的内化(焦虑、抑郁等)和外化(攻击和反社会行为)症状增多，而其积极调节行为(认知能力、社会能力、学业成就以及对父母的依恋)则减少(Conger & Donnellan, 2007)。与之相反，有研究者指出，低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专制型教养方式是对家庭经济状况的一种适应，对后代的发展可能具有积极作用(Furstenberg, Cook, Ecclels, Edler, & Sameroff, 1999)。如, Baldwin, Baldwin 和 Cole (1990)发现，高危贫困家庭中父母的专制型养育对孩子的认知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上两种观点均来自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家庭，虽然有少数研究涉及中国家庭，但是这些家庭并非来自中国本土，如：Benner 和 Kim (2010)对美籍中国家庭进行考察，发现不良家庭经济状况会引发父母对孩子的敌对和高压策略，使孩子出现学业不良、问题行为等后果。现有研究表明，养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具有跨文化的非普适性(Dwairy, 2010)，所以，由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家庭中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本土家庭，仍需进一步检验。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流动家庭已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然而，只有少数研究考察了流动家庭中父母养育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如，张茜洋等(2017)发现，在流动家庭中，父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龄期儿童的元认知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城市家庭中却不存在，这似乎说明在两种不同家庭中，父母养育与儿童发展的关系也有所不同；而在另一项研究中，母子关系的亲密程度对学龄前儿童社会适应行为的预测作用在流动和城市家庭中没有差异(李燕芳等，2014)；在同一模型中对家庭流动身份、青少年发展与父母养育进行考察时，没有发现后者在前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Zhang et al., 2017)。综合以上分析，一方面，以往研究多集中于父母的养育风格或养育类型，且主要以较大年龄儿童或青少年为对象，少有研究涉及父母养育实践对早期(特别是 0~3 岁)儿童发展的影响。养育实践指包含一系列具体内容和社会化目标的行为集合(Parke & Buriel, 2006)，母亲控制策略是一种重要的养育实践，在幼儿早期的行为塑造过程中起

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流动和城市家庭中，父母养育与儿童发展的关系似乎存在差异，现有研究以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为对象，得到不一致的结论。鉴于母亲控制策略与儿童早期顺从行为的密切关系(Karreman et al., 2006)，以及流动、城市家庭在经济、文化价值观及养育目标方面的不同(Chen & Li, 2012; Wang & Phinney, 1998; 邢淑芬等, 2012; 张云运等, 2015)，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考察母亲控制策略与 3 岁幼儿顺从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流动、城市家庭这两个亚文化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

父母会对男孩和女孩采用不同的养育策略，给予他们不同程度的控制与自主权(Ruble, Martin, & Berenbaum, 2006)。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我国城市人口的性别观念(Hu & Scott, 2014)及对幼儿养育的观念(Chang, Chen, & Ji, 2011)越来越趋向于强调性别平等；而流动父母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Chen & He, 2004)，更强调对男孩的控制和管教，在这种趋势下，城市和流动家庭中母亲对男孩、女孩所采用的控制策略，以及由此对幼儿顺从行为产生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另外，有证据表明，儿童顺从行为的预测因素具有性别差异(Lindsey & Caldera, 2005)，如，一项以 3~7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父母养育价值观的一致性可以正向预测男孩的自我控制能力，对女孩则起负向预测作用(Block, Block, & Morrison, 1981)；另一项学步儿研究也发现，父母养育行为、家庭环境等因素与男孩和女孩顺从行为的关系存在差异(Howes & Olenick, 1986)。Karreman 等(2006)指出，父母控制与儿童自我调节能力之间的关系受儿童性别的调节，然而却很少有研究对性别的这一作用进行考察。鉴于此，本研究的第三个目的是探讨在不同家庭类别下，幼儿性别与母亲的控制策略对幼儿的顺从行为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考察当代母亲控制策略的特点及其在家庭类别(流动和城市家庭)上的差异性，并考察母亲控制策略与幼儿顺从行为(合作性顺从、情境性顺从、不顺从)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类别和性别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更加细致深入地揭示不同亚文化群体中母亲控制策略对儿童顺从行为的影响。研究假设为：(1)相对于城市家庭，流动家庭的母亲使用更多的强控制策略、更少的弱控制策略；三种策略中，流动家庭母亲使用最多的为强控制策略，城市家庭的母亲使用最多的为弱控制策略。(2)在流动和城市家庭中，母亲控制策略与幼儿顺从行为的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特征。(3)儿童性别在母亲控制策略和幼儿顺从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由于两类家庭在性别观念等方面的不同，进一步假设，在流动和城市家庭中，幼儿性别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来源于首都师范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婴幼儿早期发展追踪项目，从社区、妇幼保健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募 122 名幼儿及其家长。参加项目的家庭包括 46 个流动家庭(男孩 28 名)和 76 个城市家庭(男孩 31 名)。其中，流动家庭的选取符合以下条件：父母双方均为在城市中的打工人员，户口在农村，未离异。城市家庭指拥有北京户籍的北京市常住人口，父母双方未离异。幼儿的筛选标准为足月、无任何已知疾病、与父母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并排除早产、低出生体重儿。

2.2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所有程序均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实验室布置保持一致，所用物品都是家庭中常见的，包括一个游戏垫、一张沙发和一张桌子。母亲带幼儿来到实验室，填写《家庭基本情况调查表》，随后进行母子互动。互动分为 3 个片段，每个片段持续 5 分钟。每次互动开始前，研究人员为参加项目的母子提供适合幼儿年龄的玩具，对母亲的指导语是“请您像平时一样和宝宝一起玩，并尽量使用我们为您提供的玩具，时间为 5 分钟，时间到了我会提醒您”。对幼儿的指导语是“XXX，和妈妈一起玩玩具吧”。母子互动结束后，研究人员提醒母亲开始收拾玩具任务，并告知母亲：“请您要求孩子将所有玩具全部收回到玩具箱内。”母亲只能为孩子做一次示范，之后用语言与孩子交流。当幼儿将所有玩具全部收到玩具箱内，或收拾玩具时间达到 3 分钟(即使仍未收完)时，任务结束。母子互动和收拾玩具都是标准化任务，遵循相同的流程，研究者通过单向玻璃观察，并使用可追踪摄像头及手持 DV 进行双重录像。

2.3　研究工具

2.3.1　《家庭基本情况调查表》

记录人口学信息，包括家庭背景(流动/城市)、母亲年龄、幼儿年龄及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等基本信息。

流动家庭中，幼儿平均年龄为 37.54 ± 1.05 个月，母亲平均年龄为 30.44 ± 3.75 岁；城市家庭中，

幼儿平均年龄为 38.24 ± 1.12 个月，母亲平均年龄为 33.39 ± 3.05 岁。由于研究周期较长，两类家庭的幼儿参加项目时的月龄($t(120) = 3.46$, $p < 0.01$)及其母亲年龄($t(120) = 4.76$, $p < 0.01$)均存在显著差异。

父母受教育水平由母亲报告：1 = 初中及以下；2 = 高中；3 = 大专；4 = 本科；5 = 硕士及以上。流动家庭中，82.6%的母亲完成了高中教育，50%达到大专水平，没有人达到硕士或以上水平；80.4%的父亲完成了高中教育，58.7%达到大专水平，达到硕士及以上水平的 3 人(6.5%)。城市家庭中，除了父母各一人外，其余全部完成高中教育；93.4%的母亲达到大专水平，40.8%达到硕士及以上水平；97.4%的父亲达到大专水平，42.1%达到硕士及以上水平。两类家庭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均存在显著差异，$t(120) = 6.91$, $p < 0.01$, $t(120) = 5.82$, $p < 0.01$，均为流动家庭低于城市家庭。

家庭月收入水平由母亲报告：1 = 1500 元以下；2 = 1500~3000 元；3 = 3000~6000 元；4 = 6000~10000 元；5 = 10000 元以上。流动群体中，21.7%的参与家庭平均月收入在 6000 元以下，39.1%的介于 6000~10000 元之间，高于 10000 元的占 39.1%；城市群体中，7.9%的家庭平均月收入低于 6000 元，介于 6000~10000 元之间的占 17.1%，达到 10000 元以上的为 75%。两类家庭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t(120) = 3.59$, $p < 0.01$，流动家庭低于城市家庭。

本研究将父、母受教育水平及家庭经济收入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指标(郭海英，陈丽华，叶枝，潘瑾，林丹华，2017)，三者之间存在中等程度以上的相关(r = 0.47~0.72)，将其分别转换为标准分，并求平均值，以此作为家庭 SES 总分，SES 分数越高，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在后续的分析中，将幼儿月龄、母亲年龄及合成后的 SES 作为控制变量。

2.3.2 母亲控制策略编码与计分

首先，根据 Chen 等(2000)及 Liu 和 Guo (2010)的母子互动编码方案，采用事件取样法对半结构化的母子互动中母亲的控制策略进行编码。然后，根据 Crockenberg 和 Litman (1990)的标准将母亲控制策略分类：(1)温和控制，由“建议”、“解释”、“强化”、“提供选择”这 4 种策略的频次相加，指母亲在互动过程中采取建议、鼓励或表扬、间接请求等方式与孩子进行沟通(如，母亲拿起一块儿积木说“这是一块儿积木，你拿着玩一会儿好吗？”)。(2)命令性控制，用“不含强迫的直接命令”这一策略的频次表示，指清晰的直接指令，不带有更详细的解释，声音平缓，没有明显的情绪表达(如，母亲说“你玩这个玩具”)。(3)强制性控制，由“含强迫的直接命令”、“干涉”、“批评/训斥/消极强化/消极激励”、“不赞成或拒绝”、“禁止”、“威胁”这 6 种策略的频次相加，指对孩子的批评和干预，常伴随母亲的消极情绪(如，母亲生气地说“你真是傻！”)。根据标准实验范式时长(600 s)对以上 3 种控制策略的频次进行校正。

3 名编码者在经过系统培训后对母子互动录像进行独立编码。抽取 15%的录像建立评分者一致性，3 名编码者两两之间的 Kappa 系数为 0.89、0.94、0.96。

2.3.3 顺从行为的编码与计分

根据 Kochanska 等的顺从行为编码方案(Kochanska & Aksan, 1995; Kochanska et al., 2001)，采用时间取样的互斥编码方式，对幼儿在收拾玩具任务中的顺从行为进行编码，每 10 s 为一个片段，将每个片段中幼儿的主要行为反应特征编码为以下 5 种顺从行为中的一种：(1)合作性顺从，指儿童自愿服从并执行母亲的指令，如，自觉地将玩具一件一件收入玩具箱中。(2)情境性顺从，指儿童需要母亲不断提醒才能执行指令。(3)消极不顺从，如，儿童对母亲的指令不予回应。(4)自我辩解，指儿童拒绝收玩具，且在母亲催促时通过口头或肢体形式反抗或与母亲协商。(5)挑衅/蔑视，指儿童拒绝收玩具，当母亲催促时，表现出哭闹、推搡、逃开等强烈的消极情绪。将每种行为的编码频次累加，除以所有编码行为的总次数，所得比值即为各种顺从行为的指标。由于采用互斥编码方式，故各种顺从行为的比值之和为 1。依据前人研究中对消极不顺从、自我辩解、挑衅/蔑视这三种行为性质的认定(如，Kochanska & Aksan, 1995; Braungart-Rieker, Garwood, & Stifter, 1997; Eiden, Leonard, & Morrisey, 2001)，将这三者合并为儿童不顺从行为的指标。编码由两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独立完成，抽取 30%的视频建立评分者一致性，Kappa 系数为 0.84。

2.4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 21.0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校正，多重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校正。

3 结果

3.1 流动、城市家庭中母亲控制策略的特点分析

以家庭类型为组间因素，三种母亲控制策略为

组内因素，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母亲控制策略和家庭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240) = 5.45$, $p < 0.05$, $\eta^2 = 0.04$，描述性统计见表 1。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家庭母亲使用的强制性控制显著多于城市家庭母亲，M = 4.10, 2.40, SD = 4.31, 2.49, $F(1, 120) = 7.68$, $p < 0.05$, $\eta^2 = 0.06$；温和控制略少于城市家庭母亲，M = 9.78, 11.94, SD = 6.46, 5.64, $F(1, 120) = 3.78$, $p = 0.055$, $\eta^2 = 0.03$；命令性控制无显著差异。不管流动家庭($F(2, 90) = 184.22$, $p < 0.01$, $\eta^2 = 0.80$)，还是城市家庭($F(2, 150) = 264.46$, $p < 0.01$, $\eta^2 = 0.78$)，母亲对三种控制策略的使用频次都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结果说明，两类家庭中母亲使用最多的都是命令性控制(M = 26.37, 23.82, SD = 10.49, 9.40)，其次是温和控制(M = 9.78, 11.94, SD = 6.46, 5.64)，使用最少的都是强制性控制(M = 4.10, 2.40, SD = 4.31, 2.49), $ps < 0.01$。

3.2　母亲控制策略和幼儿顺从行为的关系

两类家庭中母亲控制策略和幼儿顺从行为的相关见表 1。两类家庭中，母亲的温和控制均与幼儿的情境性顺从显著正相关(r = 0.38, 0.26)；流动家庭母亲的命令性控制与幼儿的情境性顺从显著正相关($r = 0.36$)；城市母亲的强制性控制与幼儿的情境性顺从显著正相关($r = 0.24$)。以上结果说明，无论流动还是城市家庭，母亲不同强度的控制策略都与幼儿的情境性顺从有关。

3.3　家庭类别与幼儿性别的双调节作用

为检验家庭类别、性别对于母亲控制策略和幼儿顺从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分层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的方法。将参加项目时的儿童月龄、母亲年龄及家庭 SES 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分别纳入性别和家庭类别这两个调节变量。对这两个变量进行虚拟编码，流动家庭和女孩均为 0，城市家庭和男孩均为 1。第四层纳入三种母亲控制策略。母亲控制策略进行中心化处理(方杰，温钟麟，梁冬梅，李霓霓，2015)。第五层纳入性别和家庭类别的交互项。第六层纳入母亲控制策略与性别的两因素交互项。第七层纳入母亲控制策略与家庭类别的两因素交互项。第八层纳入母亲控制策略和两个调节变量的三因素交互项。由于本研究样本量有限，根据 MacKinnon, Lockwood 和 Williams (2004)的建议，使用 Bootstrapping 法(抽样次数为 1000 次)，可以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及置信区间(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表示有统计显著性) (李丹黎，张卫，李董平，王艳辉，2012)。结果表明，性别、家庭类别及母亲控制策略的主效应不显著，但对于幼儿的合作性顺从和不顺从，均存在强制性控制×家庭类别×性别的三因素交互作用，$B = -0.10$, $SE = 0.04$, $t = -3.09$, $p < 0.01$, 95%置信区间为[−0.19, −0.05]; $B = 0.06$, $SE = 0.03$, $p < 0.01$, $t = 2.28$, 95%置信区间为[0.02, 0.13]。

接下来，将流动和城市家庭分组，分别进行分层回归，考察两类家庭中，性别对于母亲强制性控制和幼儿合作性顺从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流动家庭中，强制性控制与性别对幼儿的合作性顺从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B = 0.05$, $SE = 0.02$, $t = 3.15$, 95%置信区间为[0.02, 0.11]。简单斜率分析发现，流动家庭中母亲的强制性控制负向预测女孩的合作性顺从($B = -0.03$, $SE = 0.01$, $t = -2.38$, $p < 0.05$)，正向预测男孩的合作性顺从($B = 0.02$, $SE = 0.01$, $t = 2.07$, $p < 0.05$)，如图 1。城市家庭中，虽然强制性控制与性别对幼儿的合作性顺从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B = -0.04$, $SE = 0.02$, $t = -1.74$, 95%置信区间为[−0.09, −0.003]，但是简单斜率分析发现，不管是对于男孩还是女孩，母亲的强制性控制均未

表 1　母亲控制策略和幼儿顺从行为的描述性统计量及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M*	*SD*
1.温和控制	1	0.31**	−0.02	−0.22	0.26*	0.08	11.94	5.64
2.命令性控制	0.52**	1	0.47**	−0.06	0.20	−0.05	23.82	9.40
3.强制性控制	0.46**	0.49**	1	−0.09	0.24*	−0.05	2.40	2.49
4.合作性顺从	−0.14	−0.23	0.001	1	−0.58**	−0.80**	0.77	0.25
5.情境性顺从	0.38**	0.36*	0.27	−0.70**	1	0.04	0.09	0.13
6.不顺从	−0.02	0.03	−0.17	−0.90**	0.35*	1	0.12	0.19
M	9.78	26.37	4.10	0.80	0.06	0.13		
SD	6.46	10.49	4.31	0.25	0.12	0.18		

注：*$p < 0.05$,**$p < 0.01$。对角线以上对应城市家庭，对角线以下对应流动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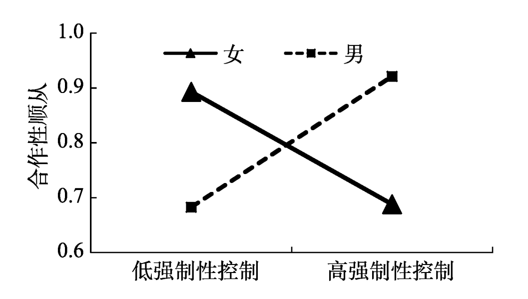


图 1 流动家庭中幼儿性别对母亲强制性控制与幼儿合作性顺从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能显著预测其合作性顺从。

采用相同的分组方法，考察两类家庭中，性别对于母亲强制性控制和幼儿不顺从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流动家庭中，母亲强制性控制与性别对幼儿的不顺从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B = -0.03$, $SE = 0.02$, $t = -2.68$, 95%置信区间为[−0.08, −0.02]。简单斜率分析显示，流动家庭中母亲的强制性控制负向预测男孩的不顺从($B = -0.02$, $SE = 0.01$, $t = -2.72$, $p < 0.01$)，而未能显著预测女孩的不顺从，如图 2。城市家庭中，性别对于母亲强制性控制和幼儿不顺从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未达显著水平，$B = 0.01$, $SE = 0.01$, $t = 0.76$, 95%置信区间为[−0.01,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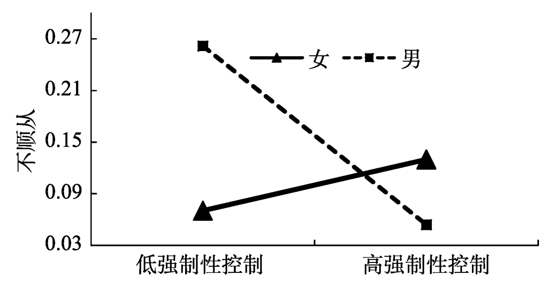


图 2 流动家庭中幼儿性别对母亲强制性控制与幼儿不顺从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流动和城市家庭母亲控制策略的比较

本研究对流动和城市家庭进行考察，发现这两类家庭中的母亲在不同控制策略的使用频次上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家庭，流动家庭中母亲使用的强制性控制更多，温和控制较少，这与本研究最初的假设一致，说明流动家庭中的母亲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高控养育方式，这一结果支持了家庭压力模型的观点。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流动家庭的母亲更为认可传统的教养方式，倾向于使用较强的控制策略来维持父母权威，以达到集体主义倾向(group-oriented)的社会化目标(Chen, Bian, Xin, Wang, & Silbereisen, 2010)。另一方面，受传统养育观的影响，流动家庭中的母亲“管”孩子的观念可能更为突出，Chao (1994)指出，特别是在强调孩子的行为需要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时，这种“管”的观念就会进一步使父母增强对孩子的控制。随着人口流动越来越趋向于家庭化，流动家庭对城市生活的融合度不断提升(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2)，流动家庭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环境，发展出符合城市社会规范的行为模式，因此，相较于城市父母，他们会更多地采用强制性控制来约束幼儿的行为。另外，流动家庭母亲自身的特点，如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生活和工作状况等，可能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限制她们在与幼儿互动过程中使用建议、强化、提供选择等方法，而更倾向于使用控制性较强的策略来获得幼儿的立即顺从。

与本研究假设不一致的是，两类家庭中的母亲使用最多的均为命令性控制，最少的都是强制性控制，这与早期国内研究者对 3~4 岁幼儿的研究结果一致(陈会昌等，2003)，表明尽管经过了将近 20 年的变迁，当代中国母亲在控制策略上仍保持着与上个世纪相似的特征。这一点在跨文化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到近期的研究均表明，中国母亲比西方国家的母亲表现出更多的控制性养育行为(Wang & Phinney, 1998; Ng, Pomerantz, & Deng, 2014; Huang & Lamb, 2014)，这说明植根于文化价值观的养育策略会表现出很强的传承性(Sung, 2010)，虽然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的融合能够引起某些文化规范的变化，但在中国家庭中，父母养育这一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似乎尚未受到根本影响。

4.2 母亲控制策略与幼儿顺从行为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类家庭中，母亲的强制性控制和命令性控制都与幼儿的情境性顺从相关，前人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如 Huang 和 Lamb (2014)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儿童年龄、消极情感等一系列变量后，母亲的强制性策略仍能显著预测儿童的情境性顺从；Koenig, Cicchetti 和 Rogosch (2000)发现母亲的直接命令与 3~4 岁幼儿的情境性顺从存在正向关系。这反映了儿童对较高强度控制策略的暂时服从。而关于温和控制与儿童顺从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带有指导性质的母亲策略与儿童的合作性顺从有关(如：Chen et al., 2003; Huang & Lamb, 2014)，也有少数研究发现母亲的指导与

儿童的情境性顺从存在关联(Braungart-Rieker et al., 1997)。本研究中, 不管在城市还是流动家庭中, 母亲的温和控制均与儿童的情境性顺从显著正相关,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 不管是温和控制, 还是命令或强制性控制, 其出发点都是引发儿童表现出父母期望的行为, 实际上都是一种控制, 与基于鼓励自主的指导、建议不同。其二, 实验室情境与家庭自然环境不同, 母亲会随着儿童的行为反应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 当儿童收拾玩具时, 说明他们已经顺从了母亲的指令, 此时, 母亲会停止使用较高强度的控制策略, 而改用较低强度的策略(Koenig et al., 2000)。另外, 儿童的顺从行为与其努力控制能力(effortful control)密切相关(Murray & Kochanska, 2002)。努力控制是指抑制优势反应并执行非优势反应, 以及计划、纠错的能力, 2~3 岁开始发展, 学前期得到较大提升(Rothbart, Sheese, & Posner, 2007), 5 岁左右时儿童才能较长时间地抑制某种自动化反应(Garon, Bryson, & Smith, 2008), 因此, 本研究中的幼儿在收拾玩具(首先需要抑制正在发生的行为, 即玩玩具; 接着执行一个新的行为, 即收拾玩具)这一较为复杂的任务中(Braungart-Rieker et al., 1997), 可能尚无法持续表现出成熟的合作性顺从, 而是需要母亲的不断提醒或发出指令才能坚持完成任务。

4.3 家庭类别、性别对母亲控制策略与幼儿顺从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回归分析中, 由于控制了三种控制策略之间的相关, 故其对幼儿的顺从行为均未表现出显著的主效应。然而, 调节作用的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流动家庭中母亲的强制性控制与幼儿合作性顺从的关系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母亲的强制性控制制约了女孩的合作性顺从, 这符合家庭压力模型的基本观点, 即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 高强度的母亲控制不利于儿童的良好发展。而男孩的情况则恰好相反, 母亲的强制性控制促进了男孩的合作性顺从, 并抑制了他们的不顺从行为, 这说明在流动家庭中, 母亲的强制性控制不但没有制约男孩顺从行为的发展, 反而是对其起到了保护性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受传统性别观的影响, 流动父母对男孩抱有更高的期望, 希望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就(Chen et al., 2010), 根据 Bronfenbrenner (1977)的观点, 这种性别的意义会通过文化价值观和宏观系统的实践影响儿童, 如, 流动父母对男孩的期望可能反映在母亲的日常控制行为中, 当男孩对这些期望有所理解时, 他们可能对母亲的要求给予较为积极的回应。城市家庭中, 并未发现性别与母亲控制策略对幼儿顺从行为的交互作用,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养育行为的文化适应性, 父母养育不仅在不同的文化亚群体(流动家庭/城市家庭)中影响不同, 而且对同一亚群体中的不同人群(男孩/女孩)也具有特异性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也为父母养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最重要的是找到针对某一群体的最适宜的养育策略, 而不是简单地将某一环境下所得到的结论推广到所有群体中" (Baldwin et al., 1990)。

综上所述, 本研究采用行为观察的方式, 考察流动和城市家庭中母亲控制策略的特征, 母亲控制策略与幼儿顺从行为的关系以及家庭类型、儿童性别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一方面, 虽然在两类家庭中, 母亲使用最多的均为命令性控制, 但是, 与城市家庭相比, 流动家庭中的母亲更多地使用强制性控制, 较少使用温和控制, 这与家庭压力模型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 本研究发现在流动家庭中, 儿童性别在母亲控制策略与幼儿顺从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部分支持了 Karreman 等(2006)的观点, 即父母控制与儿童自我调节能力之间的关系受到儿童性别的调节, 不仅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同时也提示不利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父母的养育实践对儿童的影响不是绝对的, 而是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除儿童性别之外, 还有哪些因素会在这一关系中起作用,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 采用横断设计, 缺乏动态性, 难以深刻剖析母亲控制策略和幼儿顺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另外, 儿童 3 岁前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家庭, 接触的主要是家庭内部成员, 而 3 岁以后, 随着入园及日常活动范围的扩大, 流动儿童逐渐接受城市文化, 并进入城市原住民及其子女的社交圈, 即开始了与城市原住民子女的融入过程(李思霓, 崔丽娟, 王斯, 翁佳佶, 2009), 作为早期社会化和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内容(Kochanska et al., 2001), 流动儿童顺从行为的特征在社会融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 这一点也值得进一步采用纵向追踪研究加以探讨; 第二, 本研究的数据由实验室观察编码所得, 相比问卷调查更具生态效度, 但在实验室情境中, 母亲和幼儿可能受陌生环境的影响, 表现出非典型行为。因此, 今后的研究应结合多种测量方法收集数据, 获得母亲和幼儿行为特征

的更为全面的信息；第三，在影响顺从行为的幼儿自身特征中，本研究只对性别这一个因素进行了考察，前人研究指出，幼儿的气质也可能会影响母亲控制和幼儿反应的关系(Braungart-Rieker et al., 1997; Huang & Lamb, 2014)，今后的研究应对这一因素予以考虑。第四，除流动儿童之外，我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幼儿生活在农村，他们可能由父母抚养，也可能由祖父母或其他亲属抚养，成为留守儿童(Zhang et al., 2017)，未来的研究需将这些幼儿纳入考察范围，与城市、流动群体进行比较，对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抚养者的养育特征及其对幼儿顺从行为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

虽然存在以上不足，本研究对儿童早期的母亲养育实践具有一定的贡献：首先，目前流动家庭父母的养育及其子女发展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尚未涉及该群体儿童早期的父母养育实践，本研究的探索补充了这一方面的内容。其次，从对母亲的养育实践进行早期干预的角度来看，以往研究多认为母亲的弱控制策略有利于儿童合作性顺从的发展，而强控制策略的作用则相反，但是本研究的发现说明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群体中，母亲控制策略对儿童的影响具有特异性，因此，任何干预方案都不应该是孤立的、局限的，而要综合考虑父母所处群体的经济、文化特征，同时又要考虑儿童自身的特点(如性别)。

5 结论

本研究首次对流动家庭中母亲的控制策略及幼儿的顺从行为进行考察，并比较了流动和城市两种家庭中幼儿性别的调节作用，结论如下：(1)流动和城市母亲使用最多的均为命令性控制；相较于城市母亲，流动家庭中的母亲更多地使用强制性控制，而较少使用温和控制。(2)流动和城市母亲不同强度的控制策略均与幼儿的情境性顺从存在正向关系。(3)家庭类别和性别对母亲强制性控制与幼儿顺从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流动家庭中，母亲的强制性控制正向预测男孩的合作性顺从，负向预测其不顺从；母亲的强制性控制负向预测女孩的合作性顺从。城市家庭中，性别对母亲强制性控制和幼儿顺从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

参 考 文 献

Baldwin, A. L., Baldwin, C., & Cole, R. E. (1990). Stress-resistant families and stress-resistant children. In J. Rolf, A. S. Masten, D. Cicchetti, K. H. Neuchterlein, & S. Weintraub (Eds.),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pp. 257–2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ner, A. D., & Kim, S. Y. (2010). Understanding Chinese American adolescents'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sights from the family stress model.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1), 1–12.

Block, J. H., Block, J., & Morrison, A. (1981). Parental agreement–disagreement on child-rearing orientations and gender-related personality correlates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52*(3), 965–974.

Bornstein, M. H., & Cheah, C. S. L. (2006). The place of “culture and parenting” in an ecological contextual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al science. In K. H. Rubin & O. B. Chung (Eds.), *Parenting beliefs, behavior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pp. 3–33).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Braungart-Rieker, J., Garwood, M. M., & Stifter, C. A. (1997). Compliance and noncompliance: The roles of maternal control and child temperament.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8*(3), 411–428.

Bronfenbrenner, U. (1977). Toward an experimental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2*(7), 513–531.

Chang, L., Chen, B. B., & Ji, L. Q. (2011). Attributions and attitudes of mothers and fathers in China. *Parenting, 11*(2–3), 102–115.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4), 1111–1119.

Chen, H. C., Li, D. H., Hou, J., & Chen, X. Y. (2003). Maternal control strategies and the child’s compliant behavior in family free pla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5*(2), 209–215.

[陈会昌，李冬晖，侯静，陈欣银. (2003). 家庭游戏中的母亲控制策略与儿童顺从行为. *心理学报, 35*(2), 209–215.]

Chen, W., & Liu, J. J. (2012). Family patter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Population Journal,* (6), 3–8.

[陈卫，刘金菊. (2012).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人口学刊,* (6), 3–8.]

Chen, X. Y., Bian, Y. F., Xin, T., Wang, L., & Silbereisen, R. K. (2010). Perceived social change and childrearing attitudes in china. *European Psychologist, 15*(4), 260–270.

Chen, X. Y., & French, D. C. (2008).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1), 591–616.

Chen, X., & He, H. (2004). The family in mainland China: Structure, organiza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child development. In J. L. Roopnarine & U. P. Gielen (Eds.), *Famili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pp. 51–62).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Chen, X. Y., & Li, D. (2012). Parental encouragement of initiative-taking and adjust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from rural, urban, and urbanized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6), 927–936.

Chen, X. Y., Liu, M. W., Li, B. S., Cen, G. Z., Chen, H. C., & Wang, L. (2000). Maternal authoritative and authoritarian attitudes and mother-child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in urba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4*(1), 119–126.

Chen, X. Y., Rubin, K., Liu, M. W., Chen, H. C., Wang, L., Li, D., … Li, B. S. (2003). Compliance in Chinese and Canadian toddlers: A cross-cultur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7(5), 428–436.

Conger, R. D., & Donnellan, M. B. (2007).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8*, 175–199.

Conger, R. D., Wallace, L. E., Sun, Y. M., Simons, R. L., McLoyd, V. C., & Brody, G. H. (2002). Economic pressure in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family stress mode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8*(2), 179–193.

Crockenberg, S., & Litman, C. (1990). Autonomy as competence in 2-year-olds: Maternal correlates of child defiance, compliance, and self-asser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6*(6), 961–971.

Department of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of Migrant Population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China. (2012). *Report on China's migran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2010*.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2012).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0*.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Dong, S. Y., Liang, X., Zhang, Y., & Wang, Z. Y. (2017). Maternal posi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toddler's compliance: Prediction from maternal sensitivity in infancy and bidirectional effects of autonomy encouragement in toddlerhood.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9*(4), 460–471.

[董书阳, 梁熙, 张莹, 王争艳. (2017). 母亲积极养育行为对儿童顺从行为的早期预测与双向作用: 从婴儿到学步儿. *心理学报, 49*(4), 460–471.]

Dwairy, M. (2010).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section 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parenting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9*(1), 1–7.

Eiden, R. D., Leonard, K. E., & Morrisey, S. (2001). Paternal alcoholism and toddler noncompliance. *Alcoholism: Clinical & Experimental Research, 25*(11), 1621–1633.

Fang, J., Wen, Z. L., Liang, D. M., & Li, N. N. (2015). Moderation effect analyses based 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8*(3), 715–720.

[方杰, 温忠麟, 梁东梅, 李霓霓. (2015). 基于多元回归的调节效应分析. *心理科学, 38*(3), 715–720.]

Furstenberg, F. F., Jr., Cook, T. D., Eccles, J., Elder, G. H., Jr., & Sameroff, A. (1999). *Managing to make it: Urban families and adolescent suc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ron, N., Bryson, S. E., & Smith, I. M. (2008). Executive function in preschoolers: A review using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1), 31–60.

Guo, H. Y., Chen, L. H., Ye, Z., Pan, J., & Lin, D. H. (2017). Characteristics of peer victimization and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A longitudinal stud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9*(3), 336–348.

[郭海英, 陈丽华, 叶枝, 潘瑾, 林丹华. (2017). 流动儿童同伴侵害的特点及与内化问题的循环作用关系: 一项追踪研究. *心理学报, 49*(3), 336–348.]

Howes, C., & Olenick, M. (1986). Family and child care influences on toddler's compliance. *Child Development, 57*(1), 202–216.

Hu, Y., & Scott, J. (2014). Family and gender values in China: Generational, geographic, and gender differenc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7*(9), 1267–1293.

Huang, C. Y., & Lamb, M. E. (2014). Are Chinese children more compliant?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in observed maternal control and child complianc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4), 507–533.

Karreman, A., van Tuijl, C., van Aken, M. A. G., & Deković, M. (2006). Parenting and self-regulation in preschoolers: A meta-analysis.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15*(6), 561–579.

Kochanska, G., & Aksan, N. (1995). Mother-child mutually positive affect, the quality of child compliance to requests and prohibitions, and maternal control as correlates of early internalization. *Child Development, 66*(1), 236–254.

Kochanska, G., Coy, K. C., & Murray, K. T. (2001). The development of self-regulation in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life. *Child Development, 72*(4), 1091–1111.

Koenig, A. L., Cicchetti, D., & Rogosch, F. A. (2000). Child compliance/noncompliance and maternal contributors to internalization in maltreating and nonmaltreating dyads. *Child Development, 71*(4), 1018–1032.

Kopp, C. B. (1982). Antecedents of self-regulation: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8*(2), 199–214.

Li, D. L., Zhang, W., Li, D. P., & Wang, Y. H. (2012). Parental behavioral contro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ggression and social withdrawal in early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8*(2), 201–209.

[李丹黎, 张卫, 李董平, 王艳辉. (2012). 父母行为控制、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早期攻击和社会退缩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2), 201–209.]

Li, S. N., Cui, L. J., Wang, S., & Weng, J. J. (2009).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attribution style and coping strategy on social integration among migrant childr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5), 1070–1073.

[李思霓, 崔丽娟, 王斯, 翁佳佶. (2009). 归因风格、应对方式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 *心理科学, 32*(5), 1070–1073.]

Li, Y. F., Xu, L. Y., Lv, Y., Liu, L. J., & Wang, Y. (2014).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adaptive behaviors for preschool migrant childre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0*(6), 624–634.

[李燕芳, 徐良苑, 吕莹, 刘丽君, 王耘. (2014). 母子关系、师幼关系与学前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6), 624–634.]

Lindsey, E. W., & Caldera, Y. M. (2005). Interparental agreement on the use of control in childrearing and infants' compliance to mother's control strategies. *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 28*(2), 165–178.

Liu, M. W., & Guo, F. (2010).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child behaviors in Canada and China.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1*(2), 109–114.

Mackinnon, D. P., Lockwood, C. M., & Williams, J. (2004). Confidence limits for the indirect effect: 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 and resampling method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9*(1), 99–128.

Murray, K. T., & Kochanska, G. (2002). Effortful control: Factor structure and relation to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behavior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0*(5), 503–514.

Ng, F. F. Y., Pomerantz, E. M., & Deng, C. P. (2014). Why are Chinese mothers more controlling than American mothers? "My child is my report card". *Child Development, 85*(1), 355–369.

Parke, R. D., & Buriel, R. (2006). Socialization in the family: Ethnic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W. Damon, R. M. Lerner (Series Eds.), & N. Eisenberg (Vol.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3.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6th ed., pp. 429–503). New York: Wiley.
Rothbart, M. K., Sheese, B. E., & Posner, M. I. (2007). Executive attention and effortful control: Linking temperament, brain networks, and genes.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1), 2–7.
Ruble, D. N., Martin, C. L., & Berenbaum, S. A. (2006). Gender development. In W. Damon, R. M. Learner (Series Eds.), & N. Eisenberg (Vol.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3.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6th ed., pp. 858–932). New York: Wiley.
Schaffer, H. R., & Crook, C. K. (1980). Child compliance and maternal control techniqu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6*(1), 54–61.
Sung, H. Y. (2010).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parenting practices of East Asian families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older adolescents: A qualitative study.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1*(2), 199–214.
Wang, C. H. C., & Phinney, J. S. (1998). Differences in child rearing attitudes between immigrant Chinese mothers and Anglo-American mothers. *Early Development and Parenting, 7*(4), 181–189.
Xing, S. F, Sun, L., Wang, Y., & Wang, Z. Y. (2012).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of children's parenting behavi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Educational Research,* (11), 122–127.
[邢淑芬, 孙琳, 王媛, 王争艳. (2012). 我国社会变迁背景下儿童养育行为的代际差异. *教育研究,* (11), 122–127.]
Zhang, G. Z., Eisenberg, N., Liang, Z. B., Li, Y., & Deng, H. H. (2017). The relations of migrant status and parenting to Chinese adolescents'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41*(3), 320–328.
Zhang, X. Y., Leng, L., Chen, H. J., Fang, X. Y., Shu, Z., & Lin, X. Y. (2017).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economic status and cognitive ability of migrant childre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2), 153–162.
[张茜洋, 冷露, 陈红君, 方晓义, 舒曾, 蔺秀云. (201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2), 153–162.]
Zhang, Y. Y., Luo, F., Tao, S., Luo, L., & Dong, Q. (2015).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migrant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8*(1), 19–26.
[张云运, 骆方, 陶沙, 罗良, 董奇. (201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教育投资对流动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 *心理科学, 38*(1), 19–26.]

Maternal control strategies and children's compliance among urban and rural-to-urban migrant families

WU Meng[1,2]; CHEN Xinyin[3]; ZHANG Ying[1]; LU Shan[1]; WANG Zhengyan[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 Learning and Cognitive Key Labora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3, *China*)
([3]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A* 19104-6216, *USA*)

Abstract

An important issue in early socializ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is how parents exert control i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nd how children comply with parental direction. Moreover,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maternal control strategies may be affected by social-cultural contexts and their changes. Due to the dramatic social change in urba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s, for example, compar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1990s, contemporary parents may use less coercive or power-assertive control strategies to encourage child autonomy. As a result, there may exist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parents and migrant parents with a rural background in their control behaviors. Nevertheless, little is known about migrant parents' control strategi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ldren's compliance behaviors. Thu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ontrol strategies used by urban and migrant mother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ldren's compliance. We were also interested in gender effects given that urban mothers might be more likely than migrant mothers to emphasize gender equality in childrearing.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included 122 mother-child dyads (46 from migrant families). Mother-child interactions and maternal and child behaviors in a clean-up sessions in the laboratory were videotaped. Maternal control strategies (gentle control, direct control, forceful control) and children's compliance behaviors (committed compliance, situational compliance, noncompliance) were coded. Repeated measure, MANOVA,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first showed that both urban and rural-to-urban migrant mothers used more direct control strategies than other strategies. Migrant mothers used more forceful control and less gentle control than urban mothers.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maternal control strategi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children's

situational compliance in the two groups. Specifically, migrant mothers' gentle control and direct control strategie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children's situational compliance, and urban mothers' gentle control and forceful control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children's situational compliance. Finally, family type and gender had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ternal forceful control strategies and children's compliance behaviors. Simple slope analysis showed that migrant mothers' forceful control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mmitted compliance in boys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mmitted compliance in girls. Migrant mothers' forceful control was also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noncompliance in boys. The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mothers' forceful control and their children's compliance behaviors were not moderated by child gender.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factors ma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parental control strategies and their functions in child development. Parenting practices intervention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group the parents belong to, and also the children's characteristics (e.g., gender).

Key words maternal control strategies; compliance behaviors; rural-to-urban migrant family; urban family; child gender